

试论扎赉特旗“四清”运动

仁钦¹，李玉伟²

(1.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2.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20世纪60年代, 内蒙古自治区各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 普遍开展了农村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文以扎赉特旗为例, 探究了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扎赉特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5年7月开始, 到1966年5月停止, 涉及旗、公社的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运动经历了准备阶段、清理阶段和建设阶段。工作团进入村队以后, 向群众宣讲政策, 发动群众, 进而培养积极分子。为了提高干部们对运动的认识, 召开了旗两千会和公社三千会。运动暴露了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等现象, 并进行了处理, 对生产实践中的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整顿, 解决了村队生产、生活的一些具体问题, 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 由于运动总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 不切实际地强调阶级斗争, 强调打击“复辟活动”和“走资派”, 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不少“左”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内蒙古; 半农半牧区;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扎赉特旗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1962年9月23日至27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对国内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会议重新强调阶级斗争, 开展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批判, 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过分地估计了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 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会后, 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运动也称“四清运动”。其前期, 在城镇是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 在农村是进行“四清”(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分工, 又称“小四清”); 其后期, 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城乡统称“四清运动”, 又称“大四清”。1963年2月,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重点是讨论和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前, 各地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 结合原已开展的整风整社, 陆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

从1957年冬天开始, 内蒙古自治区连续进行过数次不同内容的农村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总体目的是向人民群众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巩固人民公社, 争取农牧业大丰收。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 内蒙古地区也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 这一运动影响了内蒙古社会的多个层面。目前, 在关于内蒙古现当代历史的研究成果中, 对这一问题的专题研究较少。在几部关于内蒙古地区史的著作中提及了该问题, 代表性的著作有《内蒙古自治区史》、《内蒙古通史纲要》。^[1]另外, 在一些曾担任中共内蒙古党委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领导人的回忆性论著中也提及了该问题, 代表性的有《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2]等。可以说, 目前尚未见到专门论述此问题的学术论文。本文利用相关史料, 以扎赉特旗为例, 力图探究20世纪60年代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系列问题, 诸如在典型的半农半牧区, 哪些问题成了运动的焦点? 因地区特点, 运动的重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运动过程呈现出什么特征? 等等。

—

1962年10月8日至11月3日, 中共内蒙古党委召开工作会议和第十五次全委会议, 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 讨论了内蒙古的农牧业问题, 决定对各族农牧民和基层干部进行一次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发展农牧业生产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同时开展国际主义和爱国

主义教育。12月27日，中共内蒙古党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进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63年4月1日，中共内蒙古党委召开二届一次全会，强调了中共八届一中全会提出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从1963年冬天开始，按照中共中央“双十条”^①的精神，分期分批地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村牧区社教运动。11月13日，中共内蒙古党委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成立，王铎任组长，常振玉任副组长。^[3]1964年1月，自治区直属机关和9个盟市抽调17,600多名干部，组成“四清工作队”，开展社教工作。9月，又从农村、牧区借调10,000多名知识青年和复员军人，充实社教工作队，全面展开“四清运动”。截至1965年7月，约有15%的大队进行了“四清运动”。从1965年冬到1966年5月，进行了第二批“四清运动”，约占全区38%的大队开展了社教。^[4]

笔者查阅了社教时期扎赉特旗的档案、文献资料，试以该旗为例，分析农区及半农半牧区的若干问题。扎赉特旗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半农半牧区，蒙汉民族杂居。该旗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5年7月开始。^[5]运动初始时，涉及到11个公社，26个大队，206个生产队，7630户，42068名居民；划定三类公社1个，占开展运动公社的9%；三类大队19个，占73.1%；三类生产队58个，占28.6%；四类生产队9个，占4.4%。运动也涉及旗、公社的党政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工作团由自治区、盟和各旗抽调的人员组成，共1735人，组成7个分团。^[6]工作团进入村队以后，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工作团成员向群众，特别是向贫下中农宣讲政策，鼓励群众敢于面对面或背对背地揭发问题。其次是通过访贫问苦、多方考察和了解、个别教育等方式，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

按照中共内蒙古党委及盟委社教领导小组的指示，当年9月初召开了旗两千会和公社三千会。参加旗两千会的干部包括旗委委员，旗直属机关副科级以上干部，各工作点的公社书记、社长，工作面上的公社书记等共118人；参加公社三千会的干部包括贫下中农代表、点上公社党委委员，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大小队干部，全体党员，面上大队支部书记等共1322人。旗两千会，是由工作团和旗直属分团共同主持领导；公社三千会是集中点上所有公社的三级干部，以分团为单位进行的，会议时间为10至12天。会议的目的是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解除顾虑，特别是消除许多干部存在的“等待挨整”的消极情绪。^[7]

至9月下旬，全旗约有参加运动的积极分子2110名，每个生产队约有10名左右。这些积极分子里面，有840名骨干分子。这时期，通过揭发问题，即所谓“揭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发现问题。当时认为，问题“相当严重”，即所谓的“阶级敌人”，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拉拢腐蚀了不少干部；一部分基层组织及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也很严重。据社队初步排队，1777名干部的情况如下：一类377名，占21.2%；二类928名，占52.2%；三类443名，占24.9%；四类29名，占1.7%。通过开会教育等方式，让干部们对运动有深入的认识。这时，一些干部主动交代了一些问题。截至当年9月底，有173名干部交代了贪污盗窃等问题，涉及款额11830.96元。^[8]

当时认为，社教应促进生产。因此，社教工作队的一项重要工作即帮助解决村队生产、生活的一些具体问题。在运动推进的过程中，基层干部较为普遍地参加了生产劳动，如农田里的劳作、打草、积肥等。一些工作队还帮助群众解决了口粮不足、缺柴烧、患疾病等困难。同时，在此运动的准备阶段，进行了阶级预登工作。通过发外查通报等方式，核定“专政对象”。对党、团、民兵、妇女等基层组织，进行摸底排队。同时，审查了民兵队伍，清理了枪支、弹药；广泛开展理论学习等活动，学习“主席著作”，“大唱革命歌曲，排演革命戏”。^[9]

四清工作团认为，农村及企事业单位揭发出来的问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阶级敌人”进行“复辟活动”。其典型材料比如，好力保公社的一地主分子曾预言，“再过几年，穷人下地狱，富人上天堂”。另外，努文本仁公社的一个劳动点，出现了一地主“拒不参加劳动，唆使其子专打贫农和共产党员子女”的事件。工作团认为，这些“阶级敌人”在“公开反攻倒算，打击贫下中农，教子复仇，谩骂共产党，破坏集体经济，散布反动谣言”。^[10]

工作团的报告还指出，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很严重，有的集体经济已处于瘫痪状态”。报告

中举例，五家户公社巨宝屯大队集体经济连年下降，收入很低，而个体经济却有很大发展，队干部和一些群众利用自留地和镐头地种蔬菜，收入较多。工作团认为，这些大队的经济生活“已走向了两级分化”，一部分人由于经营自留地有方，收入高，而另外一些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低，缺吃少穿。^[11]

关于当地干部，“社会上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造成干部队伍和平演变的严重性。”工作团认为，许多干部丧失了阶级立场，与“阶级敌人”甚至“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例如，二龙山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仅存在占用公款（1900元）等问题，而且与一些地主、富农分子攀亲结友。绰勒公社的一位干部“竟亲自给地主分子操办丧事”。干部们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有投机倒把、多吃多占、挥霍浪费等。在阿尔本格勒公社召开的三干会上，共揭发出有投机倒把行为的干部77人，占参加会议干部119人的64%。^[12]

工作团在9月下旬的报告中还指出，由于审查不严，用人不当，造成了干部队伍和某些组织的不纯。^②资料记载，罕达尔公社有35名党员和干部的出身、历史不清。该公社医院的院长存在“重大的政治嫌疑”，该人“曾写过对现时不满的反动诗”。^③

干部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是“革命意志衰退，贪图享乐，吃喝玩乐”，甚至出现了“腐化堕落”，“陷入了变质的深渊”。其中，阿尔本格勒公社、小城子公社和好力保公社的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较为严重。出现这些思想问题的缘由是“阶级斗争的影响”以及“领导机关的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高官厚禄，养尊处优”。^[13]当时认为，这些问题属于政治思想上的右倾。

在运动准备阶段，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工作团特别重视发动群众。工作团成员采用多种方式及灵活的方法开展工作，特别是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即坚持所谓“三同”，向群众宣传文件精神。当地普遍开展了家庭会、讲家史、搞回忆等活动。工作队的成员将群众揭发的问题与文件精神对号，帮助群众“认清当地阶级斗争形势”。第二，培养积极分子。其选拔标准是“既要注意纯洁性和革命性，又要注意群众性和代表性”。在工作中，“既要大胆使用，又要严格要求”。这些积极分子的前途是，“经过运动的培养和提高，有些人将成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的则成为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第三，“一分为二”地对待干部，强调“大是大非不能放过，枝节问题不要纠缠。对于大多数群众公认的好干部，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分清是非，调整和群众关系。”对于三类四类干部，是“革命问题，绝不能姑息迁就。要对他们讲清政策，指出前途，充分发动群众，从各方面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积极争取三类，分化孤立四类，迫使他们交代问题，痛改前非，争取党和群众的从宽处理。”^[14]

二

清理阶段是整个运动的关键阶段，工作队在发动群众基础上，通过干部“洗手洗澡”和“对敌斗争”，“掀起了反和平演变、反资本主义的高潮”。当时认为，开展干部“洗手洗澡”应具备以下条件：①群众已经发动起来；②有了积极分子队伍；③大体上摸清了干部的主要问题；④干部初步有了“自觉革命”的要求。开展干部“洗手洗澡”主要采取“领导教育、群众帮助、自我革命、查账查证四结合”的方法。具体做法分四个步骤：①把“洗澡”、“下楼”干部的问题交给群众，发动他们背靠背地议论和酝酿，分清问题的主次和性质；②在干部“洗手洗澡”前以大队为单位召开干部会，进一步交待政策，帮助提高认识，启发“自觉革命”；③在积极分子小会上初步进行检查“洗澡”；④开群众大会进行检查，针对主要问题，进行揭发、分析和批判。^[15]

组织干部“洗手洗澡”采取了先易后难，按类进行的方法，先进行一、二类，再进行第三类，争取尽早解放一、二类干部，使其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既搞运动，又抓生产，然后集中精力解决三类干部的问题。^[16]在干部“洗澡”中关注两种人，一是对某些“老好人”严肃批判；二是对于工作认真，方法简单的干部，也不要扭住不放。但是无论哪类干部的“解放”，都由群众作主，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工作组不包办代替。对于“解放”的干部，实行“三结合”，使他们有职有权地参加运动和组织生产；对符合入会条件的，吸收他们加入了贫下中农协会。^[17]事实上，有些干部

在“解放”后，仍然有一些情绪或顾虑，怕得罪人，工作不够大胆。有些群众和积极分子对此还有一些看法，通过对其加强思想教育，通过谈心，召开解“疙瘩”会，进一步调整好关系，加强了团结。

对三类干部的“洗手洗澡”，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通过发动群众，经过个别串联，把群众和知情者充分发动起来，力争把所有的“秘密”完全揭开，搞清这些干部的主要问题。同时，对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依靠群众，通过查账、查证，内查外调，个别对证的方法，查对核实，澄清问题；反复向其交待政策，耐心地进行争取教育，促进其“早日归队”；做好家属工作，化阻力为助力，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工作组、积极分子和已解放的干部，共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整顿队伍，统一思想，研究如何解决三类干部问题。对三类干部“洗手洗澡”采取的方法是：①把三类干部的问题交给群众，让群众议论和揭发。②让积极分子明确三类干部的主要问题，“研究斗争方法，做到心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③对他们的问题一般是先在小会上搞清，再在大会上分析批判。④斗争的基本方法是“政策攻心，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本人说明情况，必要时还可以摆出问题，让其一一交待清楚”。[18]在进行干部“洗手洗澡”的过程中，当地开展运动特别注重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在查账的过程中，强调“反和平演变”。

在干部“洗手洗澡”基本结束后，运动陆续转入了“对敌斗争”。斗争对象主要包括“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骗钱害人的尖子”等。对他们的斗争，强调贯彻政策，讲究策略，针对其要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重点从政治思想上将其“彻底征服”。这个阶段的重点斗争对象是“走资派”。主要斗争方法包括，发动群众，使群众与“走资派”划清界限，结成“四清统一战线”，造成声势，迫使“走资派”彻底交代问题。同时，根据群众揭发的问题，发现线索，掌握证据，斗争“走资派”。斗争阶段，经过训练的运动积极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批斗会以小会为主，大中小会相结合。工作团认为，这项工作也是对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19]

三

根据“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的精神，当地工作团主要开展了思想、组织、生产三方面的建设。

思想建设方面，主要是对旗、社进行“革命化建设”，对群众进行教育。所谓旗、社的革命化，主要依据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针对领导层的精神状态方面进行思想建设。当时，组织各级干部“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学习焦裕禄等模范干部的事迹。[20]关于群众的思想教育，主要是针对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梳成辫子”，对其进行系统的阶级再教育，采用的方法包括忆苦思甜、忆苦思变④等。同时期，对干部和群众还进行了备战备荒教育，目的是使其树立“为革命种田和人定胜天的思想，把种田同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联系起来”。[21]

组织建设方面，主要强调要加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系统的党课教育，采取党内外结合的方法，开展整党工作。在运动中，重视对基层组织的建设。基层组织以党支部为核心，包括队委会、贫协、团支部、民兵、妇联等组织。在开展运动的同时，对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予以考验。[22]截至1966年5月底，当地农村新发展中共党员315名，新发展共青团员1130名，贫协会员发展到10636名，占贫下中农应入会人数的62%。[23]

生产建设方面，主要开展了群众性的“生产革命大辩论”，引导群众认识到搞生产要突出政治。这时期，重点宣传了毛泽东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在生产实践中，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比如，好力保公社动员了全公社30%的劳动力参加了水利工程建设，修成了1条干渠、3条支渠。同时期，各公社还开展了打井、植树、积肥等生产建设。[24]结合生产实践，还进行了一些组织参观、现场会议等活动。

在建设阶段后期，采取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的办法，对整个运动进行了复查补课和全面验收。各地的四清工作团召开了贫代会，对这次社教运动进行了全面总结，特别是力图纠正处理问题中曾出现的偏宽偏严现象。[25]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包括扎赉特旗在内的内蒙古农村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即停止了。

考察上述的社教运动，可以看出，其中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左”的问题。在笔者接触到的档案文献里，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述。比如，当时特别强调阶级界限，一些基层干部因此受到了批评，甚至被“揭发”、“斗争”。阿尔本格勒公社乌兰拉布台的三队队长，由于在社员的婚礼上，“与地主分子坐在一起吃喝干杯”，被四清工作团认为是“阶级界限模糊”、“不坚持原则”。[26]社教运动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农区、半农半牧区把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作为运动的重点内容之一。工作团认为，“少数社员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还很严重。他们留恋私有，留恋单干，仍然把镐头地、自留地当做命根子。”音德尔分团东升大队对贫下中农、中农里面的成年人进行了排队，认为“对社会主义道路处于中间状态”以及“消极、甚至反对”者约占到半数。[26]

四

在当地关于民族工作领域的社教，除了具有在其他农村地区社教的一些特点以外，还有很明显的边疆、民族地区的特点。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检查了民族工作的落实、实施工作。开展运动时，工作团发现了一些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工作团的文件记载了当地在民族政策的实施方面存在如下问题：①重视农业而轻视畜牧业；②公文用汉文而不用蒙古文；③蒙古族干部人数较少；④在一些地区，应发给少数民族的生活补助用品，却发给了汉族农民。[27]

如同在其他领域，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社教运动，同样出现了“左”的问题。运动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批判所谓的“资本主义思想”。四清工作者甚至把蒙古族农牧民的自留畜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作为“工作”重点。例如，阿尔本格勒公社前进大队是扎赉特旗最为典型的蒙古族、汉族群众杂居的大队。在人民公社化时，每户蒙古族农民以自留畜的形式得到了1至4头牛。1966年4月，当地一部分蒙古族农民的自留畜已增至10多头。[27]这说明从传统的畜牧业转向农业的牧民，擅长经营畜牧业，而且畜产收入依然是其生活的重要来源。可是，在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中，蒙古族农民的自留畜数量增长却被当作“两条路线斗争及阶级斗争在畜牧业生产上的表现”，拥有自留畜的蒙古族农民也被认为“阶级立场有问题”，成了批判和攻击的对象。[27]在运动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被看成“有问题”。蒙古族的传统宗教是喇嘛教，大多数蒙古族群众信奉喇嘛教。曾去过佛教圣地五台山或是拜见过达赖、班禅的蒙古族群众成为了该旗“社教运动”中的批斗对象。[27]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按照中共中央“双十条”的精神，内蒙古各地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大部分地区属于农区、半农半牧区的扎赉特旗，社教运动经历了准备阶段、清理阶段和建设阶段。工作团通过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和宣传教育等方式，发现了一些村队中的问题，特别是暴露了实际工作中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等现象。四清工作团予以纠正并作出了处理，对生产实践中的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进行了整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1962年开始，国内总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偏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各地的社教运动不切实际地强调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左”的问题。诸如在民族问题的认识上，乃至民族政策的落实上，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将民族问题简单化、绝对化，提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就是说，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简单地归结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并且认为民族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就是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⑤这些问题突出地体现在上述关于扎赉特旗民族工作领域的社教中。可以说，运动中“左”倾思想波及不少领域，渗透到运动过程的诸多环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生产、学习的积极性。其中许多人不再敢放手工作、进行创新。运动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①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

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同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都有十条，故被分别称为“前十条”和“后十条”。1963年11月，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十条”下发到全国城乡。各地贯彻此“双十条”精神，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②工作团的报告认为，这类问题的出现，与干部政策的“重才轻德”、“任人唯亲”有关系。

③所谓的“反动诗”即是该人于1962年元旦写作的诗词，“正堪云雪助凄凉，游子他乡忆断肠；天涯海角谁知信，滚滚红尘路茫茫。”

④变，即和平演变。

⑤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1960年代，对这一论点断章取义，去掉前提条件“在阶级社会里”，片面、绝对地理解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参见金炳镐主编：《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发展研究》（第一编，内蒙古宁夏篇），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98—99页。

参考文献

[1]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主编.内蒙古通史纲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2]王铎.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

[3]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217.

[4]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93-594.

[5]王旺盛主编.古今扎赉特[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184.

[6]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一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1.

[7]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3号）[C].关于旗社两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1—2.

[8]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一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第1—2.

[9]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一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4.

[10]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一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4—5.

[11]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一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5.

[12]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一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6—7.

[13]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一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7—8.

[14]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1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一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10—11.

[15]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32号）[C].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二次报告[A].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案卷目录号3—1—3.1—2.

- [16]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 32 号) [C]. 关于扎旗直属机关当前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11.
- [17]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 32 号) [C]. 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二次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3.
- [18] 王旺盛主编. 古今扎赉特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186.
- [19]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6/团党字 77 号) [C].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关于分团长、工作队长会议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3.
- [20]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6/团党字 77 号) [C].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关于分团长、工作队长会议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9.
- [21]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6/团党字 77 号) [C].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关于分团长、工作队长会议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8.
- [22]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6/团党字 77 号) [C].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关于分团长、工作队长会议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9.
- [23]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6/团党字 77 号) [C].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关于分团长、工作队长会议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5.
- [24]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5/团党字 32 号) [C]. 关于扎旗四清运动开展情况的第二次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4—5;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6/团党字 40 号) [C]. 关于扎旗这批运动结尾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4.
- [25]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6/团党字 40 号) [C]. 关于扎旗这批运动结尾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10.
- [26]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党委文件(66/团党字 40 号) [C]. 关于扎旗这批运动结尾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3. 6.
- [27] 扎赉特旗四清工作团文件(66/团字 36 号) [C]. 关于民族方面一些问题的报告 [A]. 内蒙古兴安盟档案馆, 案卷目录号 3—1—25.

Tentatively on the “Four Clean-ups” Movement in Zhalaite County

Rinqin¹, LI Yu-wei²

(1.Center for Mongolia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21;2.)

Abstract: In the 1960s, governments around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ly carried out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in rural and pastoral area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s issues in the Inner Mongolia agro-pastoral ecotone by taking Zhalaite County for example. Zhalaite County's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stoped from July 1965 to May 1966, involving the county and commune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The movement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preparation, clean-up and construction. When government corps joined village group, they propagandized the policy to the masses, mobilized the masses and cultivated activists. In order to improve cadres'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movement, the government held county-township cadre meeting and countryside-village-team cadre meeting. The phenomenon that some cadres had violated law

and forced command was exposed in practical work, then it was handled .The movement had some positive impact on reorganizing management in productive practice and solving some specific production and living problems in villages or teams. However, general guideline was biased, class struggle was stressed unrealistically, and “restoration activity” and “pro-capitalist rightists” were emphasized and struck, causing some “Left” problems in practical work. It struck at many cadres and people's positivity in a way and had greater negative influence.

key words: Inner Mongolia; agro-pastoral ecotone; the “Four Clean-ups” Movement; Zhalaite County

收稿日期: 2011-05-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民族区域自治在内蒙古的实践历程及相关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08CMZ001);

作者简介: 1. 仁钦 (1963-),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人。内蒙古历史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 2. 李玉伟 (1971-), 汉族,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内蒙古历史学博士,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